



西周最早的一件青铜器
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
器形古朴 凝重典雅

新中國考古五十年

啓題
功希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本社编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编辑：齐 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本社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9

ISBN 7-5010-1160-5

I. 新… II. 国… III. 考古—成就—中国—文集
IV. 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0575 号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本社 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安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开 印张：34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160-5/K·472 定 价：140.00 元

1999. 12. 2

文物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本书是继《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之后而编集的。本书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五十年以来全国的考古工作，尤其侧重介绍近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其他如博物馆工作、地面文物保护工作等基本未作介绍。全书稿件由各省、市、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管理部门或研究单位提供。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澳门也将于今年12月回归，介绍港澳五十年来的考古成果的文章已收入本书。海峡两岸虽尚未统一，但为使读者了解五十年来台湾省的考古概况，我们特编写专稿介绍了台湾考古成果。

本书是在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同志的提议和关心下编集的。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书向祖国和人民献礼。

文物出版社
1999年9月



目
录

1	北京市考古五十年
28	天津市考古五十年
40	河北省考古五十年
63	山西省考古工作五十年
8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五十年
98	辽宁省考古工作五十年
108	吉林省文物考古五十年
125	黑龙江省考古五十年
138	上海市文物考古五十年
152	江苏省考古事业五十年
168	浙江省考古五十年主要收获
181	五十年来的安徽省文物考古工作
205	五十年来福建省文物考古的主要收获
216	江西省考古五十年
231	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
247	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

277	五十年来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
295	湖南省考古工作五十年
312	广东省考古五十年
330	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古五十年
347	海南省近五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述
359	重庆市考古工作五十年
375	四川省考古五十年概略
390	贵州省考古五十年
401	云南省文物考古五十年
415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自治区考古工作成果
428	陕西省文物考古五十年
438	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
455	青海省考古五十年述要
468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五十年成就
47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五十年
501	香港澳门五十年来的考古收获
525	台湾考古五十年

北京市考古五十年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辽、金、元、明、清五朝故都的北京，除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之外，考古领域的工作几乎一片空白。而今，定陵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辽京城垣博物馆、上宅文化陈列馆、山戎墓葬陈列馆相继建成。北京考古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 五十年历程追思

回顾北京五十年的考古历程，可从三个阶段去温故知新。

1949年至1965年是扩充新发现的阶段。北平解放时，为保护城内古迹，中共北平军事接管委员会中特设文物部，从国民党手中接管了故宫博物院、皇家园林以及一些破败不堪的古建筑。1951年7月，北京市文物调查组成立后，年轻的考古队员怀着满腔热忱翻开了北京考古的新篇章。金中都的调查、明万历帝定陵的发掘、董四墓村明代妃嫔墓的清理都是当年令考古界瞩目的事件。尤其定陵是建国后有计划发掘的第一座皇陵，1959年开辟为博物馆。同年北京开始了全面的文物普查工作，11个区县调查登记了7445项文物^①。虽然古墓葬和古遗址所占比例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更多的是地面文物，但以考古学发展史的眼光看，不能苛求只培训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员们不漏掉任何蛛丝马迹，几百个墓葬和遗址已经是填补空白的壮举了。

1966年至1984年是缓慢发展的阶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考古队员焦灼、无奈地注视着毁古建、拆长城、砸佛像的破坏行为，四处维护，疲于奔命。据统计，从炼钢厂熔炉前救出的金属文物有117吨，从造纸厂碎纸机下抢回的图书资料有320余万吨，从查抄物资集中点里拣选出的各类文物有53.8万件，但是仍有700多尊佛像和121通石碑被砸成碎块，54公里的长城多处被拆毁。在1984年文物普查登记时，除了新发现4772项外，由1959年11个区县7445项文物锐减到19个区县共1457项^②，一

个满目疮痍的数字！连 1972 年首次进行大规模发掘的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也是从推土机前力保下来的^③。其间，元大都遗址、大葆台西汉墓的发掘在断续地进行中。

随着 1985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成立，北京的考古工作者进入了一个理性思维阶段，深感对文物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清理、保护、描述上，需要从更高的层次来把握考古文化的脉络。在此前后，国家文物局推出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将考古发掘和整理的要点规范化。又由于国外学术思潮的涌进，中国考古界呈现出活跃的姿态，一方面展开全方位的理论探讨，另一方面期望着田野资料的新信息为理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应运而生，北京市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带着课题发掘的考古工地，基建考古也全面铺开，构成巨大的基建网络。其间大大小小的发掘和调查百余处，北部的旧石器遗址调查，东北的平谷上宅新石器遗址的发掘，西北的延庆玉皇庙春秋战国墓地的发掘，西南的房山镇江营先秦遗址、琉璃河燕国城址的发掘和金陵调查，西部的门头沟辽金时期龙泉务窑址以及金中都水关遗址、元代耶律铸墓的发掘尤为重要。西周燕都、辽金城垣等 4 个博物馆就是此间建立的。考古人用汗水营造着北京考古的黄金时代！

二 石器时代的北京先民

石器有着漫长的历史，与之相伴的北京先民经历了气候的转变、工艺的进步，充分展现了人类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近年来诸多考古资料的出土，使得北京的专家学者对石器时代的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

1. 两种旧石器工业

本世纪 30 年代前后发现了周口店旧石器早期北京猿人诸地点和旧石器晚期山顶洞人遗址。1949 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一直没有间断^④，1973 年发掘了旧石器中期新洞人遗址^⑤。90 年代调查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旷野活动地点或遗址 38 处，计早期 1 处、中期 18 处、晚期 19 处^⑥。建国以来发现的古生物化石地点也有 40 余处，多为晚期，有相当一部分与人类活动遗迹共存^⑦。90 年代的调查结论认为，大多数地点的标本较少，多无冲磨和风化痕迹，属原地较快地掩埋。推测当时人类活动于河岸和丘陵地区，在进行采集和狩猎时就近制作生产工具，短期停留后离去，这些地点均属临时性的宿营地和活动场所。可见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愈加频繁地活动于平原区域，不断地增强生活能力，为最终走出洞穴做好准备。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北方存在着三种工业，其一为小石器工业，其二为细石器工业，其三为细石器与小石器共存的工业^⑧。北京地区已知的有两种工业，即第一种和第三种。目前发现的旧石器晚期的 20 处地点中，平谷县马家屯、小岭两处属于第三种工业，其余 18 处均为小石器工业（含山顶洞人遗址）。东城区王府井的东方广场是一处重

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临时活动营地，面积约 2000 平方米，揭露面积 780 平方米。1996 年 12 月至 1997 年 8 月，发掘并进行了重要遗迹的迁移。出土标本近 2000 件，其中石制品 700 多件，有石核、石片、石锤、石钻、刮削器和雕刻器等，原料以燧石为主，多为石片石器。骨制品有骨核、骨片、骨器，有些骨片上有人工砸击和刻划的痕迹，还有些骨制品和石制品上附着赤铁矿粉。用火遗迹有烧骨、烧石、木炭和灰烬。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牛、马、鹿、兔、鸵鸟等。 ^{14}C 年代测定数据之一为距今 24030 ± 350 年。

由此向前追索，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地点均以小石器为主。

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猿人生息于距今 46 万年~23 万年之间。其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⑨。出土的石器数以万计，原料主要为劣质的脉石英，后期水晶、燧石类原料有所增加，并尽可能地选用优质石英，表明长期的生产实践使北京猿人对岩性的认识逐步提高。石片制造方式多采用砸击法。石制品中以石片工具为主，多向背面加工，有相当多的未经第二次加工就使用的石片，还存在着许多小工具。早期用大石片做工具，主要分为砍砸器和刮削器两类，砍砸器约占一半。中期出现端刃刮削器，砍砸器减少，工具有小型化趋势。晚期尖状器、雕刻器数量增加，砍砸器锐减，小型工具明显增多。通过对石器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北京猿人文化不断进步的连贯性过程。1991 年发现的密云县上甸子乡黄土梁地点^⑩，出土石制品 16 件，地面采集 36 件，以劣质的安山岩为主，打片采用锤击法，偶尔采用碰砧法，加工方式为向背面，石制品较粗大，多数标本在 60 毫米以上。其与北京猿人石制工具的差别应为遗址类型的差别，黄土梁地点更符合旷野活动的特点。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马家坟地点^⑪位于平谷县东部约 21 公里处，出土石制品 19 件，地面采集 7 件。多为小型石片，5 件石器均是石片加工的刮削器，长度在 40 毫米以下。原料以石英岩和燧石为主，采用锤击法打片，偶见砸击法。修整石器的方式多为向背面加工。细石器的诞生是时代的产物，打制石器的逐渐小型化是其产生的前兆。

与石器工业发展相伴随的是人类体质的进化。建国前后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计有 203 件^⑫，约代表 40 多个男女个体。有 1 个晚期的中年男性头骨的脑容量为 1140 毫升，大于早期 4 个头骨的平均脑容量，并具有枕骨圆枕退缩、眉嵴较弱、脑颅骨壁较薄等特征。新洞人的男性左上第一前臼齿的形态较北京猿人进步，各项测量数据介于北京猿人与山顶洞人之间，填补了二者体质发展上的缺环。山顶洞人化石有 7~10 个男女个体。60 年代初，有关专家对山顶洞人进行重新研究，认为其基本特征代表了原始的黄色人种，与欧洲古人类有明显差异。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地安人这三个黄种人的支系，很可能是由山顶洞人或更晚的近山顶洞人散布到各地后演变而成的。

关于距今 70 万年到更新世结束期间环渤海地区古气候的变化，已有专家进行了精

辟概括^⑬。总趋势是由温暖湿润走向寒冷干燥，森林减少而草原增加。距今70~20万年间，曾有多次暖湿、干冷的交替，但湿润的时间多，北京猿人就是生活这样的环境里。距今20万年始，气候渐趋干冷，降水量渐少，搬运能力减弱，河流中很难找到大块优质砾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小石器为主的旧石器工业的发展速度和文化改观。距今1.15万年，气候走出最恶劣期，渐趋温暖，山顶洞人出现于此时。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资料来源应包括采集和狩猎，一般的遗址和地点均分布于依山傍水之处，对谋取食物十分有利，在某些季节里可能是相当丰裕的。

2. 新石器文化的断层

据环境考古学研究成果^⑭，距今2万年后的华北平原终于进入末次大冰期，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0℃还多，在又干又冷的气候作用下，黄土迅速堆积。距今1万余年时，冰期过去，气候温润，万象更新。距今8000年始，是一派草木繁荣和禽兽出没的景象。

北京地区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⑮和怀柔县转年遗址^⑯。东胡林遗址发现了轻度石化的人骨和装饰品，未发现陶器及磨光石器，转年遗址的遗物填补了这些空白。转年遗址位于怀柔县宝山寺乡转年村西、白河第二阶地上，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堆积分四层，第4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由于采用了水洗法提取微小遗物，收获丰富，共获遗物18000件，多为石器，有打制的石片、砍砸器、尖状器等，磨制的石斧、石钵等。细石器制作精良，有石核、石叶、刮削器等。陶器以夹粗砂褐陶为主，烧制火候较低而质地疏松，内外器表颜色不一。从陶片断面观察，可看出片状贴筑痕迹，器类简单，均为平底的筒形罐和盂，器表素面，个别口沿施堆纹和乳丁纹。数量众多的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石容器共存，是转年遗存的突出特点。¹⁴C年代数据一为距今9210年，一为距今9800余年。

距今8000年前后，北京地区迎来最适宜人类生存的气候环境，同时诞生了两个不同系统的文化。

镇江营一期文化是以房山区镇江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最下层堆积命名的^⑰，分布区域自北京西南部达河北省中南部，叠压在后冈一期文化（镇江营遗址新石器第二期遗存）之下。文化内涵可归纳为：(1)红陶占绝大多数，胎质含云母颗粒及粉末，器表为均匀的红色，也有外表多红色，并夹杂着灰色、黑色斑块；(2)素面为主，个别器表局部有锥刺纹和划纹；(3)圜底器为主体，釜、钵、红顶碗、小口壶、支脚是常见器物；(4)极少鼎，彩陶只有1片，系用尖状物蘸着红颜料划出的纤细的网状纹；(5)大量地使用打制的石片石器，多为河卵石加工而成，有砍砸器、斧、磨盘、磨棒等，细石器较少，磨制石器更少。陶器胎质软，推测是采用露天式覆烧方法烧成，烧成温度低。用泥片接筑法制陶，陶器易残断，胎壁厚薄不匀。房屋的踩踏面形状不规则，看上去更像一个简陋的窝棚。有的烧灶建在屋外。¹⁴C树轮校正年代数据证明，镇江营一期文化是距今9000年

~7000年的一支文化，在已区分的早、中、晚三期中，中期的遗迹、遗物非常丰富，说明这支文化的繁荣期当在距今8000年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中期的灰坑里出土了1件盂，口沿下施一周刻划的折线纹，与磁山文化的盂十分相似。

上宅文化是以平谷县上宅遗址的第二期遗存和北埝头遗址命名的^⑬，分布于北京的东北部和天津市、河北省的唐山地区，叠压在兴隆洼文化（上宅遗址第一期遗存）之上，后冈一期文化（上宅遗址第三期遗存）之下。陶器以夹砂和夹滑石的红褐陶为主，有的可看出贴筑法痕迹，器壁厚而火候低，颜色不匀。器表多有抹压、刮条、压印“之”字、篦点、剔刺麻点、刻划等纹饰。多平底筒形罐，另有盆、钵、舟形器、鸟首形镂空器以及猪、羊、熊、海马等小型动物塑像。石器以打制的大型盘状器和琢制的细石器为多，磨制石器较少。房屋为半地穴式，平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长径在4米以上，室内无明显门道痕迹，居住面中部均埋有一二个深腹罐，罐内存有灰烬和木炭，靠墙的地面上发现较多的陶、石器。上宅文化可区分为三期，¹⁴C数据为距今6540±100年、6220±110年、6000±105年。若有树轮年代校正，有望达到距今8000年前后。

后冈一期文化发现于房山县镇江营遗址（镇江营新石器第二期遗存）、平谷县上宅遗址（上宅第三期遗存）、密云县燕落寨遗址^⑭。该文化分布在南至河南省中部、北达内蒙古南部、西迄山西省东部的广大区域，可分为三期。中、晚期的年代经树轮校正为距今6400~6000年^⑮。北京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多为零星的灰坑和文化层，其文化内涵可概括为：(1)泥质红陶为主，较少的夹云母褐陶；(2)素面占多数，少量的划纹和弦纹；(3)圜底器稍多于平底器，钵碗类器物较多；(4)伴生少量的釜形鼎和直线条红彩；(5)基本使用磨制石器。

雪山一期文化因首次发现于昌平区雪山遗址的下层而得名^⑯，其后在房山镇江营遗址（新石器第三期遗存）乃至河北省的蔚县、易县均有发现。为进一步了解雪山遗址的文化面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81~1983年再一次发掘雪山遗址。该文化的陶器以夹云母褐陶为主，陶色偏暗，器表素面，典型器物是高领双耳罐和筒形罐，均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从镇江营遗址提供的地层叠压关系得知，雪山一期文化晚于后冈一期文化，早于雪山二期文化。

雪山二期文化见于雪山遗址的中层^⑰、镇江营遗址（新石器第四期遗存）、昌平区燕丹等。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泥质灰陶。器表多有纹饰，如绳纹、篮纹、方格纹、附加堆纹等，器形以有耳或无耳、高领或矮领等诸多形制的深腹罐为主，其次是平底盆、双腹盆，另外还有鬲、甗、鼎、器盖等。其他省区龙山时期文化常见的快轮制陶方式在雪山二期文化中并不普及，一般只在器形稍小的盆、壶、罐、碗类泥质陶器上使用，大型器物仅口沿有快轮修整的痕迹。石器制作相当精良，通体磨光。房屋为椭圆形半地穴式，东南壁有门道，居住面的东北部遗有烧灶。依镇江营遗址新石器第

四期遗存的¹⁴C树轮校正数据，雪山二期文化的年代应在距今4800年以降。

为使年代的脉络更加清晰，摘取有关资料简约成下表。

年代 (距今)	分布区域	西南地区	东北地区
约10000年~9500年		东胡林遗址	转年遗址
约8500年~7000年		镇江营一期文化	上宅文化
约7000年~6000年		后冈一期文化	
约5400年~5000年		雪山一期文化	
约4800年~3900年		雪山二期文化	

如表所示，距今7000年之前，北京地区同时生息着两个文化系统，即以镇江营一期文化为代表的圜底器系统和以上宅文化为代表的平底器系统。二者的器物群各具特色，尤其是早期的陶器群，看不出文化交流的迹象。二文化以永定河为界，各安其境。上宅文化到了晚期阶段，出现了少量的红顶碗。该文化的传统是夹砂陶，早期几乎不见泥质陶器，就文化发展的惯性而言，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像红顶碗这样的细泥陶器，只能是在外来因素的作用下才有的新变化。镇江营一期文化始终伴生红顶碗，并有演变规律可循。若将红顶碗看作圜底器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圜底器系统跨过永定河向北方推进，发生在上宅文化的晚期阶段。

上宅文化与亦属平底器系统的转年遗址的文化继承关系尚不清晰，因为从转年遗址素面孟向上宅文化布满纹饰的筒形罐的转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至少还存在着相当长时间的缺环。

距今7000年以后，后冈一期文化、雪山一期文化、雪山二期文化相继覆盖了北京地区。后冈一期文化和雪山一期文化区别甚大，前者属泥质陶器为主的圜底器系统，直接继承了镇江营一期文化，后者属夹云母陶器为主的平底器系统，与上宅文化的关联并不紧密。后冈一期文化的釜鼎不可能衍生出雪山一期文化的双耳罐，二者没有文化承袭关系。雪山一期文化和雪山二期文化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雪山二期文化以三足器作为炊器，不可能由雪山一期文化的平底器演化而来。并且这三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年代上的缺环。

可以说，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前期呈现出两种文化系统的割据状态，后期则是不同种文化系统的逐次更替局面。每个文化系统的中心区都不在北京。镇江营一期文化、后冈一期文化均产生在河北省中南区域，上宅文化的腹地在河北省的唐山地区，雪山一期文化、雪山二期文化的来龙去脉虽然还很模糊，但是，就其突兀登场和陡然匿迹的情形看，也很难说是北京地区土生土长的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北京地区是不同系统文化圈

的切合部位，各种文化如匆匆过客交替登台，始终没有形成本土的文化。

三 商周燕国觅踪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夏代，新石器时代那种几度江山易主的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北京由此形成一个稳定的文化圈。商代甲骨文之“𠄎”、西周铜器铭文之“匱”、东周西周铜器铭文之“𠄎”、西汉之“燕”，绵延数千年而成为北京的代称。这一扭转乾坤之变应归功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一支人马的大举南迁及其后裔与祖地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后，除了西周殖民性的北徙外，更多的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反复南下，造成了该文化圈强烈的北方文化色彩。

1. 夏商之燕

据镇江营遗址孢粉分析，商代的北京处在干旱草原型环境下，植被以灌木和小乔木为主，遥想当年，必是一片田园牧歌的景象。

昌平区雪山遗址曾被称为雪山三期文化，类似夏家店下层文化。由于田野资料未发表，无法参照对比。随着京津唐考古工作的展开，又产生了燕山类型^②、燕南类型^③、大坨头类型^④等称谓。经过分期和年代方面的研究，这类遗存被界定为夏至商前期的遗存^⑤。北京地区的此类遗存时代较晚，以房山县塔照遗址塔照一期遗存为例，其四个¹⁴C树轮校正数据在公元前1881~前1429年之间，基本开始于夏的后期，结束于商之前期。除昌平区雪山遗址、房山县塔照遗址和镇江营遗址之外，类似的遗存在昌平区下苑和张营^⑥、丰台区榆树庄、平谷县刘家河^⑦、密云县凤凰山^⑧、房山区琉璃河^⑨和西营^⑩等遗址均有发现。

年代较早的以密云县凤凰山墓葬为代表。该墓发现于1984年，长方形土坑竖穴，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南，未见葬具。随葬筒腹鬲、鼓腹鬲、假圈足罐、折腹尊、粗把豆等8件陶器，置于头部附近。鬲、尊、豆与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⑪同类器物相比，均有变化，大甸子墓地的年代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735~前1463年，凤凰山墓葬的年代应相当于夏之后期。

年代稍晚的以房山区塔照一期遗存为代表。塔照遗址的最下层发现11座墓葬，集中在发掘区的中南部，分东、中、西三排，多为东西向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除2座儿童墓墓圪较外，余9座成人墓墓圪大小相近，长2.3~3米，宽1米左右。二次葬占40%，头向东者占74%。侧身屈肢面北者占一半以上。皆备木棺。木棺四周的填土形成熟土二层台。少数墓有殉牲现象，计有羊、牛、猪。兽头吻部朝东，与人骨头向一致。成人合葬墓是此墓地值得注意的现象。9座成人墓中有4座合葬墓，其中仅1座异性合葬墓，余3座皆男性合葬。2具人骨分上下两层摆放。下层人骨放入木棺内，均为

二次葬。上层人骨置于木棺盖板之上，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这一点与单人墓葬明显不同。单人墓无一例外地全为一次葬，而合葬墓里二次葬占 75%。随葬品分陶器和石器两类，多在 1~3 件之间，连儿童也有一二件器物随葬。组合为鬲、盆、盂，豆、罐、盂，簋、罐、盂。夹砂褐陶约占陶器总数的 80%，余泥质灰陶。陶质均含云母粉，使器表看上去有星星点点的光亮。器表颜色不尽均匀，以泛黑褐、灰黑色为多。器表多施有纹饰，较常见的是竖绳纹，其次为划纹、附加堆纹、圆圈纹等。一件陶器上有时可见到几种纹饰，如瓮的肩部施网状划纹，腹部施竖绳纹，后又以划弦纹隔断绳纹。器形有鬲、甗、瓮、罐、豆、尊、盆、簋等。可区分为先后三个阶段，第一段年代与凤凰山墓葬接近，第三段的早组共生有二里岗上层文化的假腹豆，故知此类遗存在北京结束的时间应略晚于二里岗上层时期。

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是塔照二期文化，过去一直不为人所识，至今也有将其作为张家园上层文化一部分的。其实二者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如张家园上层文化中浓厚的商文化因素则为塔照二期文化所少见，而塔照二期文化极具特点的瘦高敛口深腹钵又是张家园上层文化所没有的。张家园上层文化的陶器呈红褐色，塔照二期文化的陶器则泛黑灰色等等，所以区分为先后两种文化，有利于认识它们各自的文化特征。

由于近年来较注意塔照二期文化的存在，已于房山区塔照和镇江营、皇后台遗址、平谷县刘家河^③和龙坡遗址发现此类遗存，以塔照遗址的中层最为典型。陶质中皆含云母粉，以夹砂陶居多，占 84%。泥质陶较少。器表颜色较均匀，泛黑褐或灰褐。器表纹饰以绳纹居多，也有弦纹、附加堆纹、划纹等。素面陶器较少。常见器物有鬲、甗、瓮、罐、甑、盆、钵等。最常见的是领部有附加堆纹的高领鬲和敛口深腹钵。高领鬲不仅具有高领、鼓腹、袋足、粗壮足跟的特征，而且模制袋足的作法别具一格，以其形制、制法、纹饰三方面的特点形成了独特风格。另外，器表滚印的粗深而僵直的绳纹也不见于前期文化。塔照二期文化在陶器形制、制陶方式等主体方面都继承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塔照一期遗存的风格，高领鬲和领部附加堆纹等则是新的气象。可以这样理解，当塔照一期遗存发展到二里岗上层之后的阶段时，受到了一种具有高领鬲、领部附加堆纹、绳纹粗而僵直的文化冲击，这种外来的新文化因素属于北方长城沿线地区。于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通过塔照二期文化走向张家园上层文化。塔照二期文化的¹⁴C 树轮校正年代数据为公元前 1266~前 1070 年，相当于商的中、晚期。

张家园上层文化于商末覆盖了永定河南北区域，目前房山区镇江营遗址、琉璃河遗址^④、平谷县韩庄^⑤、顺义县牛栏山^⑥，天津市区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廊坊、唐山地区有广泛的分布。以镇江营遗址为例概括其文化特征。房址均为圆形半地穴式，大房屋直径约 3 米，浅穴。地面用黄土铺垫，除有两个椭圆形主灶外，沿墙还有二三处烧土面。南壁有斜坡门道通向地面。大房屋周围有众多的圆形小房屋，深穴，直径 1.5~2.5 米。

地面铺垫干草、树皮，没有烧灶。只能居住1~2人。如果将大房屋推测为家族性活动场所无误的话，小房屋应是用于单独居住。墓葬均为单人仰身直肢，头向东，基本无随葬品，几乎所有未成年儿童都葬在房屋附近的灰坑里。陶器高大而厚重，以夹云母褐陶为主，有筒腹鬲、鼓腹鬲、袋足鬲、甗、盆、甑、罐、簋及有特色的制陶模具、角制工具和陶印模。角制工具相当多，常见麋鹿角制作的用于刨土的镢。陶印模则带有某种意识色彩。每个印模的表面图案排列均不相同，很可能代表着某一个家族或某个有特殊地位的人。有一件印模的表面刻画有人面图案，髡发，双髻，两颊纹面，也许表现的就是当地土人的形象。伴随主体文化因素的另一种文化因素以袋足鬲、簋、四系罐和极少量的灰陶甗为代表，明显地属于商文化系统。尤其是泥质灰陶簋的三角缘、器表折线划纹的形态与殷墟晚期至西周初期的簋完全相同。这一文化可区分为三段，¹⁴C 树轮校正数据在公元前1408~前930年，因而三段经历了商末至西周中期的阶段。商文化因素大量地涌现在西周早期，很可能与周灭商时商人北退有关。到西周中期，出现折沿、联裆、有矮足根的小型鬲，有的沿面还带有弦纹，属于周、商两种文化的结合体。西周晚期，这种结合体覆盖了镇江营遗址，张家园上层文化随之绝迹。但在河北涞水、安新、天津市蓟县等处遗址仅见张家园上层文化，尚没有发现被取代的情况。

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分布区域可东至滦河沿岸，北到承德一线，西止太行山，南达大清河。在这样大的范围内，永定河以南地区与商文化和周文化首先发生碰撞，而永定河以北地区与北方的文化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因此张家园上层文化客观上有区分地方类型的可能性，这将是今后研究张家园上层文化应加以注意的课题。由夏家店下层文化、塔照二期文化一脉相承而来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商末达到鼎盛时期。有专家考证，该文化具备建立国家政权的实力，否则很难抵御商文化的强大攻势^⑧。商王乙、辛之前，燕国的族徽就出现在金文中^⑨，如果商代有燕国存在，那必定是张家园上层文化建立的古国。

2. 西周之燕

史载周武王灭纣后封燕。西周时期的燕国，自第一代燕侯起，有八世燕侯无任何文献记载，直至第九世燕惠侯继位时，已是公元前864年。即西周早、中期历时约200年的历史，在文献中是一片空白。要了解这段历史，释读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尤为重要。

西周燕文化以周文化和商文化为主体构成，绝不是张家园上层文化的继承者。含此类遗存的有房山县琉璃河^⑩、镇江营、焦庄遗址，昌平县白浮^⑪和小北邵遗址^⑫。镇江营遗址的民用陶器以夹砂灰陶为多，袋足鬲、矮足跟鬲、侈口罐、四系罐、多孔甗、高圈足簋等为常见的陶器组合。房屋基本平地起筑，长方形，内外套间，墙基用黄土垒砌，地面用细沙多次铺垫，西墙处建有烧灶，并有烟道通向墙外。遗址中出有卜骨，背面经过平整和钻凿，正面刻出米粒大小的两行数字，专家鉴定为易经卦象。镇江营遗址

西周燕文化的初期曾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最晚期并行过一段时间，但前者很快覆盖了整个遗址，迫使张家园上层文化的人们离开了家园。

琉璃河遗址在燕国的中心位置，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于1997年列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点课题。1986年，燕侯墓M1193随葬的铜鬲、铜盃上发现了有关封燕内容的铭文，于是，该遗址作为燕国的始封地已无异议。琉璃河遗址东西长3.5、南北宽1.5公里，面积5.25平方公里。遗址中部伫立着一座夯筑古城，略呈长方形，南半部被河水冲毁。东西长约829米，南北残长300余米。由于城址的最南端发现一处残存的城墙内护坡，推测南、北城墙的距离应有700米左右。城墙的部分地段挖有基槽，大部平地起筑，分为主墙和内外护坡，主墙基宽3米左右，夯打坚实，模板夯筑的痕迹相当清晰，板宽20厘米，夯层亦厚20厘米，此种筑城方式是西周燕都城的建筑特点之一。内外护坡夯打稍差，城外有宽3米的护城河。东城墙的北端发现一条卵石铺就的排水沟。城中偏北有夯土台基六处，应为宫殿区。宫殿区的西南是祭祀遗迹，有的祭祀坑中葬有整头的牛或马，出有很多经过钻、凿的卜甲、卜骨，其中一片刻有“成周”二字。城外东南即燕国大型墓地之所在。已经发掘了数百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以及原始青瓷和成组的漆器。青铜器中带有“匱侯”铭的有十余件，此外还有朝覲、赏赐等内容的铭文。城内民用陶器的器类要比镇江营遗址丰富，如原始青瓷器、仿铜陶礼器、铸铜的陶模和陶范。琉璃河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相当于西周早、中、晚期。早期周文化、商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共生。中期之后，后者逐渐消失殆尽。根据城中夯土台基西周晚期已遭破坏的情况看，该城址西周晚期已不再是都城。

琉璃河遗址的考古成果使得西周燕国文化的研究达到了更高的层次。首先，燕国的始封当在营建“成周”之后。其次，琉璃河城址主要使用于西周早、中期，晚期迁往他处。第三，琉璃河墓地是燕国公墓，并非仅是贵族墓地。由于西周燕国考古资料的积累，已能够进行燕国人等级层次的划分。目前可分为六个等级层面^④，即燕侯、燕侯宗族的显贵、异族贵族、周人与异族中的次贵族、燕国平民等。依据是琉璃河墓地诸墓的规格，墓室越大，等级越高，反之越低。墓室的面积已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城址中出土有张家园上层文化陶器，在墓地中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墓葬。镇江营遗址的此类文化墓葬与琉璃河墓地的葬俗大相径庭，显然是使用琉璃河墓地的人们排斥的一种文化，应列为另外一种受排挤的等级层面，社会地位最为低下。大大小小的墓多随葬有兵器，燕侯和贵族阶层尤多，甚至还陪葬车马坑。可以看出，燕侯本人尚武，手下贵族多是军事统领，西周燕国的战争还是相当频繁的。

周人在张家园上层文化分布区域内建立燕国，不可避免地张家园上层文化发生冲突。1975年发掘的昌平区白浮的三座中型墓充分显示了这种冲突的结局。白浮墓的铜鼎垂腹柱足，铜簋带盖有珥，铜壶瘦长有盖，年代当在西周中期。白浮墓出土的陶鬲，

沿面唇边凸起，折沿，浅腹，平裆，矮足跟，是张家园上层文化的高接受周文化而产生的一种鬲。此外，昌平白浮木椁墓头向北，墓底挖有腰坑，并葬有狗骨架，与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的异族葬俗相同。就是说，昌平白浮墓从铜、陶容器及随葬习俗三点看属于西周燕国范畴。但同墓的青铜短剑、兽首刀、有鋸斧、头盔、镶满铜扣的皮靴等均带有浓厚的异族文化的特色，可见墓主的着装、佩戴的兵器遵循着本民族的习惯，而使用的青铜礼器和埋葬习俗已纳入西周燕国的轨道。因此，推测墓主人为臣属于西周燕国的异族首领之一。墓中出土的铜戟和卜甲刻有“兀”字，也有人认为是族徽。昌平白浮墓位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区域内，除一些头面人物臣服燕国之外，这一区域内很少见到周文化因素。尽管张家园上层文化被周人排挤，从永定河以南区域退却、消失，但在永定河以北却不绝如缕。

3. 东周之燕

东周是燕国文化、经济、疆域迅速扩展膨胀的时期，遗址的密集程度出人意料。仅在房山县张坊乡和南尚乐乡的山前高地上就发现了22处东周遗址⁴³。1965年，在宣武门和和平门一带发现东周陶井数十座。出土燕国货币的地点更是数不胜数。遗址之多，不胜枚举。

北京市东周燕国研究面临的第一个课题是燕上都和中都的寻觅。

燕上都蓟城的寻觅始于50年代。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王喜“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战国策·燕策》亦载，乐毅攻取齐国都城后，掠回的珍宝重器均运往蓟城献祀。可知直至战国末年，蓟城一直是燕国的中心。50年代至60年代，从西单大木仓到陶然亭一线发现数百座战国至汉代的陶井，密集区在宣武门、和平门一带⁴⁴。随后，在陶井密集区的南部地区的永定门、天坛、定安里又发现大量的战国至汉代小型墓葬，特别是白纸坊、法源寺附近的2处战国墓群，还在中南海至龙潭湖之间发现一条永定河故道，为探寻蓟城提供了线索。根据陶井和墓葬的分布推断，蓟城北墙在西长安街以南，南墙在法源寺以北⁴⁵。但是迄今为止，地面无遗迹可寻，亦无进一步的资料佐证此观点。

与蓟城的情况相反，燕中都的寻觅已有了结果。1957年在房山窦店镇西、琉璃河城址北3公里左右发现一座古城⁴⁶。经过1959年、1962年的两次调查，尤其是1986、1990年的试掘，基本搞清了该城的整体状况。窦店古城近方形，东西长1230、南北宽1040米，除去东汉至北魏修建的外城墙和小城，大城的修建不晚于战国早期，直至战国晚期仍在不断地整修和加固。保存较好南墙和西墙最宽达16米，地表城墙高6米。东、西、南墙的中部各有一门，城中主要街道呈“十”字形。夯建技术相当成熟。墙体分块夯筑，每块宽3米，夯层均匀，夯窝密集。为防止夯具粘着，夯面屡见垫草痕迹，夯打出来的墙体非常坚硬。该城的地理位置为汉之良乡县，据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